

省社科应用研究优秀成果选编(十五)

供给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思考与建议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 刘志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解决的“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理论上科学认识、从实践上准确把握，精准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设计。

一、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的三个重要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第一，在方向上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侧。造成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升级的要求。

第二，在性质上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素质性的。我国相当多的产能，大都是政府直接干预导致的，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此外，很多产能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的素质和质量达不到要求，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这种供需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性矛盾不解决，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下降，实体企业的盈利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三，在时间上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而需要中长期内不断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从理论上说，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与货币投放或回收现象有直接关系的快变量；而供给侧、体制性、素质性等结构性问题，由于需要通过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手段来解决，因此它就是一个慢变量。这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抓住最佳“窗口期”，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避免“病情”加重，保障经济社会安全。

二、供给侧改革中“资产荒”的形成与化解

2000年以后，我国市场供给短缺、资本短缺的“双短缺”特征逐渐消失，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前“双短缺”伴随的劳动过剩，变成了“双过剩”——资本过剩、商品

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即“资产荒”：一方面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同时伴随着杠杆的不断放大。这时，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缓解资本、商品两个“过剩”，增加资产供应。

化解“资产荒”，一方面，通过鼓励在实体中进行创新，把优质资产通过金融创新源源不断地供应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在资本市场中募集更多的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形成良性互动。要缓解融资成本高，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只有降低资产价格，才能降低实体企业的机会成本。降低资产价格，不是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降下来的，而需要增加资产的供应。

三、关于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的思考与建议

1. 关于去产能。这一轮去产能主要是去制造业过剩产能，国家首批重点要化解的产能是钢铁和煤炭。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自然比较严重。据测算，江苏七大支柱产业中，除纺织业之外，电子、化工、电气、钢铁、通用设备、金属制品这六个产业，均表现出显著的产能过剩现象。究其原因，其中一部分是受市场周期性波动调节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因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病根所致。此外，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也是银行和企业加杠杆运作的结果。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也是去杠杆，两者目标一致。化解产能过剩，并非是要简单地把这些企业的产能给毁坏掉，或者关停并转，在短期内，也可以用其他办法来缓解：兼并收购重组；通过“一带一路”转

移；增加内需，如把这些过剩产能运用于乡村高标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技术等级标准，如建筑物用材标准提高一倍等办法消化过剩钢铁、建材，等等。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难在劳动方而不主要是资产方。建议：政府与其补贴“僵尸企业”，不如对参与重组兼并的优势企业进行补贴；与其支持产能过剩企业，不如补贴消费者和用户；与其对过剩产能进行补贴，不如对职工进行技能培训。

2. 关于去库存。最近房价涨幅较大、过猛的城市，如南京、苏州等地，应该是“补库存”而非“去库存”。未来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价还会继续上涨，补库存的任务不能放松。对于某些库存压力较大的地区，如常州和苏北一些中小城市，可利用放开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民市民化等机遇，通过政策让利消化一部分库存；也可以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让利补贴等措施，鼓励有改善住房需求条件的本地居民购买新房，从而启动新一轮再城市化。其中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降价只会增库存，买涨不买跌是人类行为的局限性所在。但是鼓吹通过涨价去库存，有道德风险和可能进一步引发经济泡沫的风险。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降库存的任务交给基层政府，由其与房地产商共同就具体楼盘设定降价的底线，由此打破购房者进一步降价的预期。“十三五”时期，随着房地产保有税的开征，在既定税率下，房屋价值大小决定了可纳税税基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小和增长潜力，创造安全的、生态文明的、有竞争力的居住环境，成为地产发展和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3. 关于去杠杆。杠杆率高以及杠杆结构的不合理性，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边际

投资能力。这是稳增长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总体上应该是去杠杆。从总体上看，江苏经济基本面好，发展质量高，资产质量上乘，同等杠杆率但投资安全性高一些，融资的硬约束也小一些，所以江苏对“好的杠杆”可多用一些。例如，同样面积的土地资产，在江苏可能要价值更高一些，流动性更强一些，因而资产安全度更高。同时，江苏重资产行业多，与服务业相比，杠杆率运用也会高一些。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江苏重资产行业应逐步向重人力、知识、技术资本行业调整，使产业结构尽快地软化。从企业看，我国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水平的，原因不是中国企业借债多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依赖于商业银行融资，缺少长期资本来源的渠道。未来企业去杠杆，主要应该利用“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建设长期资本来源的可靠机制。从个人看，中国居民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居民相比较，其个人负债或杠杆率并不高。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央行降低个人首付的比重，其实就是给个人加杠杆。当前要高度警惕某些地区变相采取零首付、首付贷款等加杠杆手段促销，以防止新的金融风险滋生。总之，现在去杠杆应该是结构性的，即中央政府应加杠杆，个人也可以适度地加杠杆，但地方政府、企业应该减杠杆。2016年，中央政府阶段性地把赤字率提高到3%，达到了国际预警线标准。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给地方政府减杠杆，以及给企业减税降费的空间。未来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率先试行去土地财政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改革措施。

4. 关于降成本。当前虚拟经济泡沫化严

重，同时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这对制造业的机会成本影响更大，江苏制造深受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高资本成本的伤害。一般来说，制造业利润单薄，因而它对生产成本变动非常的敏感。国家降实体企业成本的行动，对江苏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江苏制造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今后主要应依靠机器换人去解决，由此提升劳动生产率，克服已经严重的老龄人口化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同时，还要降低实体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力发展我省的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强势政府的管制体制，以及较大力度的减税降费。

5. 关于补短板。与全面高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相比较，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有：经济发展仍然是重资产模式，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之后，服务业比重持续低于相应经济体，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更低；重化工业比重过大，带来单位国土面积排放总量难以控制；以国际代工模式取得利用外资、国际贸易的爆炸式成长，但外向型经济中外资企业贡献大，本土企业强大程度与本省经济总量不成正比；虽然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全国第一，但与深圳比，本土原创性科技成果少，拥有自主创新专利、著名品牌的国际大企业更少；我省地区差距虽有缩小，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后工业化社会地区、工业化社会地区和农业社会地区三种格局同时并存；收入分配差距虽然在国内较小，但是GDP中工资的含不太高，与一些发达甚至发达水平远低于我省的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未来必须千方百计地提升这一发展的标准，使人民有更多的发展获得感。

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南京大学 沈坤荣

当前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但不可否认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从需求视角来看，出口受主要国家再工业化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投资主要依靠政府而缺乏民间参与；从供给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受到制约。因此，唯有从供给侧出发，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解决“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不能被劳动和资本增加所解释的部分，一般包括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等方面。

首先，技术效率指应用当前已有技术的水平，可以视为衡量创新技术产业化程度的指标。我国专利数量逐年快速上升，但是整体产业化水平还很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专利存在结构性问题，外围专利多而发明专利少，另一方面在于专利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匹配失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鼓励发明专利的创新，减少创新市场的失灵，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并且确保企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同时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形成便捷的知识扩散与共享渠道。

其次，技术进步指技术水平向最前沿技术逼近的程度。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主要凭借技术购买基础上的逆向工程式模仿创新来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但随着我国整体技术水平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继续通过技术购买等方式获取前沿技术的空间收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一方面，构建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的体制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使得科研人员对未来有较好的预期，从而能够遵循创新的客观规律，脚踏实地专心从事科研，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营造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要避免产生与GDP崇拜类似的创新崇拜，实事求是地引导适宜性创新。另一方面，保护市场与企业家精神，避免行政干预，政府从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出发，给予企业家充分的自由，引导企业家从事持续创新而非其他投机行为。

再次，配置效率指要素配置与有效配置或最优组合的接近程度。受到体制制约，我国要素市场间长期存在流通障碍，使得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误配现象，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空间上的低效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等要素实现了城乡间从无到有的流通，但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体制藩篱至今仍然在阻碍劳动等要素的有效配置，使得资源分配呈现畸形。此外，

近年来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应政策导致了东部地区房价的过快上升,进而推高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想从供给侧出发,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需要在阻碍创新成果产业化、创新要素有效配置的环节进行体制创新,并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水平。

最后,体制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中央提出要简政放权、减少管制、破除垄断、改革国企、优化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等,从本质来看,实际上就是认清政府边界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职能分工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有其根本性质决定的利益诉求,从而也都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政府需要在保护市场、尊重市场的制度框架下承担应有的角色扮演。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发展存量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新产业增量发展的同时,也要处理好过去几年经济发展的存量问题。

1.化解产能过剩。针对目前过剩产能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和供需错配的基本情况,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标尺竞争,尊重市场规律,避免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对于一些不被市场所容纳的“僵尸企业”更要坚决淘汰,而不是强行输血维持其生存。考虑到处理“僵尸企业”可能会涉及到不良资产处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地方政府需要谨慎处理,至少做到:一是引导企业之间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国际产能合作

等方式促进市场出清。二是政府要针对性出台相关的社会政策进行兜底,减少潜在的失业可能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尤其需要避免出现新的计划经济思维,“一刀切”地对所有产能过剩不加辨识地进行去除。对于那些可能仅是暂时的,可能被未来的需求所消化的,甚至可能孕育出国家竞争力的过剩产能要审慎对待,严格根据市场机制进行甄选,真正做到让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2.降低企业成本。中央目前正在加大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力度,未来有望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减负空间,但企业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较高。针对此问题,政府需从自身出发降低税负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借助市场力量进一步拓宽企业降低成本的空间:其一,放松对最低工资的调控,根据市场情况将最低工资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并且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的市场壁垒,相应地,政府在建立统一、公平的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应该更有作为。其二,对影响物流、电力等上游行业和服务部门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破除垄断,释放物流、电力等行业的市场活力。

3.降低房地产库存。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这表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房价一路走高,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有大量的商品房闲置。针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手段主要有:其一,必须在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形成长期消费预期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并且通过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

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另外，在去库存中应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4.防范金融风险。中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可以预期，“十三五”及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要想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以往较高的增速已经不太现实。这就决定了前期经济发展中潜在的风险会逐渐凸显，甚至成为诱发危机的根源。其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金融风险，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在于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高企的杠杆率。在此目标下，重点从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入手，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

外融资核准等。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重拓展国内、国际发展新空间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重构未来经济增长新动力最重要的一环，并且只有在处理好存量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形成新老交替的崭新局面。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纷繁复杂，即使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指导下，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拓展国内发展新空间。重点是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践行“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二是拓宽国际发展新空间。重点是借助“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四个层面同时发力

江苏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的重大创新，其内容十分丰富，在落实的过程中必须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突出重点，狠抓关键，在体制、政策、产业和产品四个层面同时发力，即通过推动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

革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提质，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同时关注四个层面

1. 体制机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

要任务。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表面上看是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匹配所造成的,但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完善。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部门分割、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还大量存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对称,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制度层面的矛盾和问题。

2. 政策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我省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政策要发挥关键作用,核心是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良性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

3. 产业转型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这不仅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更重要的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向中高端攀升。

4. 产品创新提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标志。随着住、行为主的消费基本满足,居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明显提高,消费升级明显加快,日益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必须积极适应需求的重大变

化,推动产品创新提质,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有效供给。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四个层面同时发力的思考建议

1. 着力改革阻碍供给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调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加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夯实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创新创业,降低社会保障成本,增加政府在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环境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完善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不断提高供养标准。畅通失业-培训-再就业的通道,尽量减少供给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四是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工作。突出问题导向,加快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积极稳妥处理改制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探索非经

营性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有效途径，探索构建国企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工具设计”，改变以往被动的“行政划拨”为“主动整合”。创新监管手段，控制风险，提高效能，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2.着力优化供给政策和需求管理。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把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有效结合起来，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一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消除企业退出的制度性障碍。加强产业政策与土地、环保、财政、金融、价格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摸清“僵尸企业”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兼并重组、资本运营、创新发展、关闭破产等不同方式进行精准处置。实施省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分解落实淘汰落后产能年度目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落实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二是着力化解房地产库存。高质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力有序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落实有吸引力的支持政策，促进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效释放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购房需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扩大住房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支持合理住房消费，逐步消化房地产库存。三是有效推进金融去杠杆。全面摸清我省金融杠杆的情况，研究制定对策。推动金融机构通过增加自有资本等措施降低杠杆。提高融

资项目自有资金或保证金比率，严控高杠杆、高风险融资项目。加强融资融券等业务风险控制，压降证券投资业务杠杆水平。加强金融监管和监测预警，积极防范和稳妥处理各类金融风险，加快处置不良贷款，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多措并举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坚持分类指导，一企一策。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加快市场化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为重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人工、税负、社会保险、财务、生产要素、物流等成本“组合拳”，切实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五是切实补齐短板。更加关注和支持落后地区、薄弱环节、困难人群的发展，大力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水电气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利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建设，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3.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一是为传统产业重获发展机遇。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供需错位”的局面将会得到有效改善，供给质量的提高将激发有效需求，传统的“旧领域”将会衍生出新的需求，逐步形成个性化、层次化、多元化的供给市场，原有的市场需求不断升级，将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二是为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提供空间。江苏制造业实力雄厚，但服务业供给仍然不足。供给侧改革对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等方面将产生新的需求，信息及互联网产业、教育及培训产业、文化与智慧产业、服务平台与社会化服务产业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三是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奠定基础。我

省已形成配套完善的产业布局，聚集了规模颇为可观的民间资本，形成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塑造了在业界内有一定声誉的工业品牌，这些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供给侧改革，将成为经济拉升的新动力。

4.着力推动产品创新与质量提升。一是推动产品升级换代。产业升级的主体是企业，抓手就是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江苏产业转型升级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生产。精致生产就是把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做细做实。我省目前产业精细化程度还比较低，这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潜力还很大。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提升微观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着力提升消费品品质，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升级提振消费信心，从而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二是努力满足中高端需求。目前我国不少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未来10年，部分产业的中高端需求将得到井喷式释放。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的十大重点领域，都与钢铁业密不可分。据业内人士预测，未来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需要各类轴承钢180万吨/年、油船耐腐蚀合金钢100万吨/年、轨道交通大规格铝合金型材4万吨/年、高精度可转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材料5000吨。海洋工程特钢需求将达到1500万吨，能源工业特钢需求将超过200万吨，中国核电特钢需求将超过60万吨，风电带来的特殊钢需求将达140万吨。这些潜在的、客观存在的需求就

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是我们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方向。要深入推进“江苏制造+互联网”，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启动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等重大工程，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切实提高产品质量效益。三是积极打造品牌经济。调查显示，全球名牌占所有品牌的比例不到3%，却占有营销总量的一半左右。因此，要把深化发展品牌经济作为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引导江苏企业从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服务。推进企业能力成长，搭建高水平的载体，培育企业创新知识与技术能力，强化企业品牌营造能力，突破品牌化发展的能力瓶颈。培育多层次产品品牌，塑造多元化企业品牌，打造差异化区域品牌，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品牌体系。大力整合全球资源，引进高水平人才、高水平的品牌企业，加快品牌化发展的国际进程，让江苏更多优势品牌走向全球，获取更多更好效益。